

明清小说研究

曾 良 编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名：明清小说研究

作 者：曾良

出 版 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年11月

ISBN：7-5614-3085-X/I207.41

定 价：26.00元

前 言

我对明清小说的解读和研究，是 20 年前在辽宁大学读助教进修班时开始的。当时高明阁教授讲“明清小说研究”（主要是版本演变）、朱眉叔教授讲“《红楼梦》研究”、黄岩柏教授讲“中国小说史”、李谦教授讲“《水浒》研究”，他们都使我如沐春风，受益良多。回校后，我一直在他们的指导下从事元明清文学教学和明清小说研究。黄老师常在信中称我为“良子”、“吾子”，催我是“该出书的年龄了”，给我很多鞭策和鼓励；高老师是辽宁铁岭高鹗后裔，他大病初愈后，用颤抖之手写的书信，历历在目，教我奋进。我能在离开辽宁大学后不久发表论文，开设“历史演义小说研究”选修课，全靠恩师的教诲。如今，高老师已仙逝，黄老师也年逾古稀，且重病缠身，想到这些，我就不禁泪流纵横。

1

1995 年，八十四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在中央电视台播完不久，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在湖北当阳举行了第十届学术讨论会。我虽是学会会员，但限于会议规模，未能接到参会通知，此时学会副会长、四川省社科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沈伯俊研究员把自己的参会通知转寄给了我。在会上，我交流了《〈三国演义〉电视剧的缺点和错误》一文，后来发表在中华书局《文史知识》上的《〈三国演义〉卷首词不宜作题歌》就是该文的前半部分；《三国演义》电视剧精编版播出后，《北京日报》理论部的李乔、李君红两位同志又约我以答读者问的形式重谈此题（题为《重提〈三国〉卷首词与主题歌》，1997 年 6 月 4 日第 3

版)。这年八月,我又上庐山参加了江苏省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编辑部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会上欧阳健、萧绂凯主编提议由我在内江举办一次小说研讨会。后来得到了我校领导和中文系的大力支持,由内江师专、江苏省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编辑部和四川省社科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的“96明清小说研究会”在我校隆重举行。国内一批著名学者和日本、韩国一些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得热烈而成功,反响很大。我也得到了一次组织学术会议的锻炼,促进了我对明清小说的研究。此前此后,沈伯俊、欧阳健、萧绂凯等学界前辈对我的小说研究多有奖掖、提携和帮助,《明清小说研究》副主编张蕊青女士、王学均先生也对我关照颇多,我铭记在心。

1996年秋,我到复旦大学作黄霖教授的访问学者。黄老师乃忠厚长者,为人和做学问都堪称楷模,可谓德业双馨,对我循循善诱,教诲殷殷。我在他的指导下研究《东周列国志》,老师要我力求做到考据、辞章、义理三者的结合,从爬梳史料入手,使立论坚实有据,不发虚言,同时注意理论的阐释和发挥。我那本《〈东周列国志〉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要求下写成的。老师的要求未必能达到,但在学术理念上对我的影响是很深很远的。

1998年,我被全国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科教材编委会遴选为面向21世纪新教材《中国古代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编写组成员,分工我撰写明代小说部分,促使我从小说演变史角度思考问题,同时也阅读了不少文献材料。

这本《明清小说研究》就是在论文、教材的基础上陆续写成的,其中有几篇先后在《文史知识》(中华书局)、《社会科学研究》、《明清小说研究》、《海南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过,《论〈三国演义〉对妇女描写的矛盾心态》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

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多数是尚未公开发表和近年写的，《论蜀汉政权衰亡的原因》、《对比艺术在〈三国演义〉中的运用》、《〈红楼梦〉八十回后内容之探究》三篇分别与邹作圣先生、杨鑫和陈姝同志合写（文末分别有注），后两篇在我的指导下选择题目，撰写提纲，修改数稿，收入本书时我又作了修改。

还须说明的是，本书非在短时间内一气呵成，后来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已有所变化，少数篇章的部分论述也有重复的地方，但考虑到自己学术发展的轨迹还是一如旧貌的好，故未作大的改动。本书参考和借鉴了一些学界成果，有的已在文末注明，有的未能一一注明，谨在此一并致谢。但自愧资质鲁钝，又多荒疏，其中必有不少缺陷和错误，诚望读者批评指正。

著者谨记
2005年6月16日
于内江师院

目 录

前言.....	(1)
明清小说的繁荣	(1)
《三国演义》的思想和艺术.....	(15)
诸葛亮、周瑜、司马懿与君主的关系及其才智的发挥	(27)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军事科学.....	(38)
论《三国演义》对妇女描写的矛盾心态 ——兼评叶昼、毛宗岗的妇女观	(49)
史实与虚构 ——两种“单刀会”之比较	(60)
“蜀中无大将”之反思 ——论刘备、诸葛亮用人之误	(69)
论蜀汉政权衰亡的原因	(82)
对比艺术在《三国演义》中的运用	(94)
《三国演义》电视连续剧成功背后之不足	(106)
《水浒传》故事的演变和主题	(114)
《水浒传》的思想和艺术	(122)
《水浒传》英雄的滥杀无辜及其悲剧意义	(130)
《水浒传》的性观念及理学对它的影响	(140)
《西游记》的思想和艺术	(149)
《金瓶梅》的人物及其地位	(160)
《残唐五代史演义传》散论	(171)
论《杨家府演义》中的孟良、焦赞形象.....	(191)

评《杨家府演义》的崭新妇女观·····	(200)
《列国志传》、《八仙出处东游记》、《隋史遗文》点校前言 ·····	(209)
明代短篇小说概说·····	(220)
《红楼梦》八十回后内容之探究 ·····	(240)
隋唐系列小说的演变·····	(255)
是爱国还是忠君 ——评《说岳全传》的主题思想·····	(263)
论《说岳全传》中的牛皋形象 ——从二重性格组合看他的乌托邦思想·····	(274)
'96 明清小说研讨会综述 ·····	(280)
名篇探微 ·····	(289)
美良川铜鞭逞战 ——明·熊大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 ·····	(289)
王小二转面起炎凉 ——明·袁于令《隋史遗文》 ·····	(293)
张子房悲歌散楚 ——明·甄伟《西汉通俗演义》 ·····	(296)
西市上屈杀忠臣 ——明·孙高亮《于少保萃忠全传》 ·····	(300)
白塔巷 ——明·佚名《龙图公案》 ·····	(304)
僧徒奸妇 ——明·李春芳《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 ·····	(307)

招提琴精记	
——明·钓鸳湖客《鸳渚志余雪窗谈异》	(310)
葡萄架倒	
——明·冯梦龙《笑府》	(313)
献黄柑孤臣完大义	
——清·陈忱《水浒传后传》	(315)
程咬金抱病战王龙	
——清·鸳湖渔叟《说唐全传》	(319)
娶美人白狗闹洞房	
——清·郭小亭《济公全传》	(323)
献美酒五鬼闹钟馗	
——清·烟霞散人《斩鬼传》	(326)
鬼谷先生白日升天 畔房小姐黑夜打鬼	
——清·张南生《何典》	(329)
某王孙者	
——清·严蘅《女世说》	(332)
拥资财讹生关部	
——清·庾岭劳人《蜃楼志》	(334)
有理无钱贪官枉断	
——清·李伯元《活地狱》	(337)
恶鸨二打花好好	
——清·孙家振《海上繁华梦》	(340)
附录	(344)
元明清文学教学刍议	(344)

明清小说的繁荣

一

中国小说的源流

“小说”一词，在我国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小说”二字最早出于战国时期的《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指的是不合大道的琐屑言论，与作为文体意义的“小说”并不相同。此时还没有后来的小说概念，也没有人有意识地进行小说创作，但先秦神话传说、诸子散文和史传中已蕴含着不少的小说因素，对后世小说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神话传说的神异色彩是志怪小说的源头，其中一些故事和人物常为后世小说家所汲取、移植；《论语》、《孟子》、《庄子》等描绘的人物神态、言行和包含的寓言故事，为后世小说创作积累了艺术经验；特别是《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史学著作，不仅其“实录”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小说发展，而且其中不少鬼神记载和叙事写人的精彩部分，富有小说笔法，常被后人当作小说看待^①。

从文体角度提出小说概念的，是在汉代。东汉初年，桓谭在《新论》中说：“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

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江淹诗《拟李都尉陵从军》李善注引）其后，班固《汉书·艺文志》把“小说家”列于诸子之末，在一一列举了15家（1380篇）小说之后，总结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稍晚于《汉书》的张衡《西京赋》也提到小说：“匪唯玩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班固所列15家小说中，正有一家“《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可以互证。这时，“小说”已具有某种相对稳定的文体意义了，即指民间流传的野史、奇闻等，接近后来的小说。此外，刘向的《说苑》、《列仙传》，韩婴的《韩诗外传》，袁康的《越绝书》，赵晔的《吴越春秋》等野史杂记，大量采录奇闻轶事，有许多想象附会成分，颇富小说意味。

魏晋南北朝不像汉代那样重视小说理论的探讨，但却注重小说的创作实践，所以小说数量很多，内容丰富，为前所未有的。史载曹植曾“日诵俳优小说数千言”（《三国志》裴注引《魏略》），南朝刘义庆有《小说》10卷，殷芸有《小说》30卷（《隋书·经籍志》注）。而代表此时小说盛况的，是数量颇大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但这时小说的创作继续深受史传的制约，十分重视内容的真实不诬，即便是干宝也在《搜神记序》中一再强调自己写作的有根有据。诚如鲁迅所说：“六朝人之志怪，却大抵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小说至唐代，发生了质的飞跃，产生了“传奇”。明人胡应麟概括说：“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少室山房笔丛·西酉缀遗》）“作意好奇”，就是有意地进行传奇性的小说创作；“假小说以寄笔端”，是说借小说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感

情。而且唐传奇篇幅加长，“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显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标志着我国小说已步入了成熟阶段。所以它为后世所效法，成为文言小说的一个重要流派。与此同时，唐代以白话俗语为主的“市人小说”和俗讲、变文等讲唱文学，从内容到形式对后世白话小说创作都有很大影响。如市人小说是宋元话本的源头；说唱相间、散韵结合的变文，不仅是诸宫调、宝卷、弹词等说唱文学的源头，也影响到小说戏剧体制的形成和发展。

到宋代，中国小说发生了又一次飞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扩大，滥觞于唐代市人小说的宋元话本不断发展壮大起来，蔚成大观。于是，文言小说与通俗小说（白话小说）开始明显分流，而且通俗小说逐渐在小说史上占据重要位置，并最终成为主流。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南宋耐得翁《都城纪胜》、吴自牧《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等都生动记录了宋代“说话”的盛况。当时，“说话”出现了相对独立的家门，分为小说（又名银字儿）、讲史、说经、合生（或说诨话）四家。“小说”又分为“烟粉”、“灵怪”等若干类。这样的分门别类，不仅使宋元话本小说门庭各异，明清通俗小说的分类也肇端于此。从流传下来的“小说”与“讲史”看，前者篇幅较短，不少取材于当时的市民生活，大约有四五十种；后者篇幅较长，讲历史故事，今人统称为“宋元平话”，仅存8种。因为历史故事较长，一次讲不完，说话人往往选择故事引人入胜处突然中止，以吸引听众继续来听，这就是后来章回小说分回的渊源。在艺术上，宋元话本不仅故事情节生动曲折，善于通过语言和行动表现人物性格，而且使用质朴、清新的民间通俗语言，具有很强的表现力。所以，宋元话本不仅是宋元小说史上的光辉篇章，也

是中国小说史上新的里程碑。它的发展壮大，规定着此后中国小说的主流和发展方向，是通俗小说的直接源头，明代小说就是在它的基础上获得巨大发展的。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列国志传》、《封神演义》等长篇章回小说，就与《三国志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武王伐纣平话》等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明代中后期，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短篇白话小说集的整理和创作，也受宋元话本的影响。

中国文学发展的各个时期都有一种比较繁荣的文学样式，如同唐诗、宋词、元曲一样，明代小说代表了明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呈现出万紫千红的兴旺景象，并为清代小说艺术高峰的形成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二

明代小说的繁荣及其原因

明代小说的繁荣，首先表现为作品数量多，规模大，众体齐备，反映社会生活面广。

第一，长篇章回小说的诞生、发展和繁荣。明代章回小说的各种类型都大体齐备，出现了一大批长篇小说，仅流传下来和有名可考的就有近百部。被称为“四大奇书”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都出现在明代，它们成了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和世情小说的典范性作品，对明中叶以后同类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历史演义小说：主要沿袭《三国演义》的创作道路，敷演史

传，偏重叙述历代兴废争战故事。从上古故事写到明代社会，既有基本上演绎史书的历史小说，如余邵鱼的《春秋列国志传》（后经冯梦龙辑演为《新列国志》）、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等；又有取材于当朝邸报和野史传闻，反映当时重大政治事件的时事小说，如陆云龙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陆人龙的《辽海丹忠录》等。这一巨大演义系列，几乎可“与正史分签并架”（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对传播历史文化知识起了重要作用。

英雄传奇小说：主要沿袭《水浒传》的创作道路，与历史演义严格依傍史传不同，往往仅凭一些历史影子，主要通过想象虚构塑造传奇式的英雄人物。有写官逼民反的，如袁于令的《隋史遗文》等；有写抗击侵略，着重表现民族英雄的，如熊大木的《北宋志传》、纪振伦的《杨家府演义》等；还有以帝王发迹变秦为题材的，如无名氏的《英烈传》（又名《云合奇踪》）等。

神魔小说：主要沿袭《西游记》的创作道路，而以神魔鬼怪为题材。有由历史故事分化而出的神魔小说，如许仲琳（一说陆西星）的《封神演义》、冯梦龙的《新平妖传》等；由民间故事演变而来的神魔小说，如吴元泰的《八仙出处东游记》等。

世情小说：以婚姻、家庭生活为题材，描写现实生活中的人情世态，以描写家庭生活为主的《金瓶梅》出现最早。包括以写恋爱为主的才子佳人小说，如《玉娇梨》等；以专写宫闱秘闻、色情故事的猥亵小说，如《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等。

明代还出现了一大批公案小说集，有的集中写一个清官断案的故事，如安遇时的《包龙图判百家公案全传》；有的聚多人判案于一集，如余象斗的《皇明诸司公案传》；它们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此外，《水浒传》等英雄传奇小说包含的侠义小说因素，为清代中叶以后公案、侠义小说的合流准备了

条件。

第二，短篇白话小说成熟并达到了高峰。宋元话本的出现，使白话短篇小说成为中国小说史上一种新文体。到明代，文人一方面对话本进行收集整理，使之成为案头文学，如嘉靖年间洪楸编辑的《清平山堂话本》（又称《六十家小说》），就是明人最早整理的宋元话本集；另一方面又模拟话本进行创作，出现了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和陆人龙的《型世言》等选集，以及周清源的《西湖二集》等专集，标志着白话短篇小说已完全成熟。“三言”、“二拍”代表了我国白话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

第三，文言小说出现了复兴。文言小说到唐传奇达到了一个高峰，但在宋元时相对衰落。到明初，瞿佑的《剪灯新话》、李祯的《剪灯余话》、赵弼的《效顰集》等，挽回了文言小说的颓势；明代中后期文言小说呈现出繁荣局面，出现了邵景詹的《觅灯因话》、宋懋澄的《九籀集》（稗编）、冯梦龙的《情史》等专集，虽无杰出的典范作品，但多彩多姿，亦足珍视，为清初《聊斋志异》的出现做了必要的准备。

明代小说的繁荣还表现在艺术质量的提高，最突出地表现在创作主体、人物塑造和艺术结构的变化上。

从创作主体来看，由积累型转变到了独创型。《金瓶梅》以前的章回小说，均为世代积累，而后由作家写定，作家的个人风格因而不夠突出。《金瓶梅》标志着积累型向独创型的转变，全书布局统一，结构严谨，风格一致，反映了作家概括生活、反映生活能力的提高。从此，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大量涌现，层出不穷。如明末清初大批才子佳人小说和艳情小说的出现，直到《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使古代作家独创型小说艺术达到峰巅。

特别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明代小说基本上完成了从类型

化典型到个性化典型的转变。由于传统史学观念和“实录”精神的深深影响，人们常常把小说与历史混为一谈，甚至不少人曾以史书的标准来要求和评价小说，使小说创作缺乏艺术概括，难以创造出性格化典型，即便《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形象也基本上是类型化典型，性格单一而没有多少发展。到了《水浒传》，一方面开始注意到人物性格与环境的密切关系，按照生活逻辑，多侧面地关注人物性格，塑造了宋江、林冲、杨志等性格复杂而又有发展变化的艺术典型。到《金瓶梅》和“三言”、“二拍”中的部分人物，如秦重、花魁、杜十娘等人物的复杂性格不仅是表层的，而且从人物灵魂深处写出了不同个性，人物典型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基本上进入了个性化典型阶段。另一方面，《水浒传》、《西游记》中的人物基本上是理想化的、半人半神的传奇式人物，而到《金瓶梅》和“三言”、“二拍”中的人物，则基本上回到了现实生活中，不再依靠惊心动魄的故事吸引人，而是通过平常人的日常生活场景和心理活动的细致描写，刻画出丰赡华腴的艺术典型。

在艺术结构上，《水浒传》、《西游记》等世代积累型小说，情节结构往往由一对矛盾冲突构成，表现为线性的链条结构。其故事情节仅仅由某一题旨统摄起来，故事自成单元，彼此间缺乏因果联系，甚至把它们的位置互相挪移，或砍掉某些人物故事，也无妨大局，不会影响整体结构。而以《金瓶梅》为代表的世情小说，情节结构往往由两对以上的矛盾冲突构成，矛盾的任何一方都受到错综复杂的其他矛盾因素的制约，小说情节的横断面呈现出网状结构。这种结构贴近生活，丰富多彩，浑然一体，故事情节之间有着有机的联系，是小说结构的高级形态。

明代小说的繁荣，是社会条件和小说艺术自身发展的结果。

首先是商业的繁荣、市民的需要，给小说繁荣奠定了基础。从宋元到明初，市民阶层不断扩大，市民文化也不断得到发展。众多的市民不仅是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也是一支庞大的小说读者群。他们要求政治上的平等，希望为朋友讲义气，对英雄人物和功名富贵充满崇敬和羡慕之情，对色情艳遇津津乐道。所以，《三国演义》中表现的君臣平等，歌颂忠义道德，《水浒传》对市民生活的精细描写，《西游记》表现的渴望自由自在的生活等等，都受到了广大市民的激赏。明人许自昌在《柊斋漫录》中记载了时人喜爱《水浒传》的情况：“上自名士大夫，下至厮养隶卒，通都大郡，穷乡小邑，罔不目览耳听，口诵舌翻，与纸牌同行。”这无疑刺激了小说家的创作热情，因而小说得以广泛流行。

明代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因素萌芽的出现和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作为市民文化的小说便日益繁荣起来。商人为了追求金钱利益而抛弃了耕作辛劳，也抛弃了田园风光的安定生活，纷纷奔走于都市乡镇间。当时在徽州一带，人们甚至“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举反在次着”（《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为小说创作提供了崭新的素材。因此，“三言”、“二拍”中不少篇章展示了风光独异的世俗景观，使我们看到作坊主的发家经过，商人们追财逐利的艰难历程，转眼间腰缠万贯的传奇故事等等。这些新的社会生活和市民的人生体验，正是明代中后期小说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是进步社会思潮的影响。明中叶以后，社会矛盾尖锐，政局混乱，许多士人对政治产生厌倦情绪而转向追求自我解脱和自我享乐。王学左派猛烈攻击程朱理学，特别是被视为异端的李贽，掀起了追求人性解放的启蒙思潮，反对束缚个性的禁欲主义，否定圣贤的权威，并明确肯定人的私欲、情欲和凡俗的日常

生活。他说：“盖声色之来，发乎情性，由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仪，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仪可止也。”（《焚书·读律肤说》）李贽的思想，经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等发扬光大，以至于“士大夫靡然信之”，“士风大都由其染化”（《明史·异教传》），对思想文化和文学创作影响很大。在文学思想上，一方面表现人欲的倾向十分突出，小说家把构思的重心从故事转移到了人物，不仅热衷于表现商人的追财逐利，而且大胆描写男女之间的情与欲。冯梦龙就认识到“草木之生意，动而为芽。情亦人之生意也，谁能不芽者？”（《情史·情芽类·孙氏》）在“三言”里，更有王三巧偷情（《喻世明言》）、杜十娘殉情（《警世通言》）、卖油郎独占花魁（《醒世恒言》）等脍炙人口的情爱故事。而《金瓶梅》里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等人由情欲到淫欲的追求，是封建礼教高压下女性世界的又一侧面。另一方面，由于统治者滥施暴政，强化厂卫特务机构，使作家们难于直接批判现实，于是更多地选择历史和神怪题材，以比较间接的方式来影射现实社会，这也正是明中叶以后历史演义小说和神魔小说兴旺繁荣的重要原因。

第三是出版业的发达。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印刷业，长篇小说是难以普遍流行的。明中叶后，印刷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印刷技术大大提高。与此同时，统治阶级对小说戏剧的出版控制有所放松，官家印刷机构也大量刊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通俗小说。现存的嘉靖元年（1522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就是由司礼监刊印的。武定侯郭勋也刊印过《水浒传》。官家、私坊的竞相翻印，为书商谋利提供了条件，商业利润又反过来刺激了印刷业的发展，使小说创作数量激增，促进了小说的繁荣。^②

除社会原因外，中国小说在漫长的孕育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